

对垒的知识体系：西非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公民科学”与“本土知识”

梅丽莎·李奇 詹姆斯·费厄海德

引言

在当代引导大众参与科学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话语。研究亚非拉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分析家和活动家一直在讨论和促进“本土知识”(indigenous knowledge, 简称IK)及“种族科学”(ethnoscience), 而研究欧洲、北美这些高科技、后工业地区的人所关心的则是“公民科学”(citizen science)。其间的区别不仅仅在字面上。本文第一部分论述两种话语各自的理论、实践根源和侧重面, 以及由此生发的“业余”知识与现代科学的不同关系。说到底, 本土知识论强调不同知识体系的观念、道德差异和相互独立性; 而公民科学说则强调它源自与“专家”体制生产的科学的直接结合与对立。

可是还有一种说法: 一切知识都是社会的产物。它抹平了本土/科学、外行/专家之间的差别, 将其归入各种不同的视角, 以及不同社会主体因地制宜的实践。按这种说法, 上述两种观点都不大站得住。但是理论上的消解不应掩盖知识体系间结合——或对抗——方式的真实差异。我们从

加勒比海地区和西非选择了两例个案来说明上述差异。这两个案例都是关于乡村猎人围绕国家公园与受国际和国家资助的科学和政策的交锋。特立尼达猎人率直的批评方式看起来与“公民科学”论所强调的十分相符, 而几内亚的知识体系之间似乎差异较大, 独立性较强, 符合“本土知识”的观

点。我们认为, 这些差异反映了科学产生的社会和制度关系, 以及这些关系生长的特定历史, 也反映了决定着“本土”、“公民”这些分类的策略性运用和它们所表达的社会、历史关系。

不同的话语：“公民科学”与“本土知识”

科学在殖民政权、法西斯政权和民主政权下的角色非常不同, 这就对大众与

“专业科学知识”的关系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谁提出的问题和计划能成为合法的研究重点, 并付诸实施? 是仅限于实验室或发展计划的专家, 还是允许大众参与? 如果允许大众参与, 由哪些人来参与? 普通人为什么要参与(或反对)专家的事?

这些问题是欧洲、北美关于科学和社会的讨论的中心问题, 也是这方面“大理

梅丽莎·李奇 (Melissa Leach) 是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的社会人类学家、教授, 她还是环境研究组的领导人之一。Email: m.leach@ids.ac.uk。

詹姆斯·费厄海德 (James Fairhead) 是苏塞克斯大学非洲与亚洲研究学院教授。Email: J. R. Fairhead@sussex.ac.uk。

他们合作研究西非的知识、权力、科学、政策等问题, 发表了大量论著 (如《误读非洲》, 1996; 《调整森林砍伐》, 1998), 最近又将加勒比海地区纳入他们的比较研究 (《科学、政策与社会》, 待出版)。

论”复兴的核心。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贝克(Beck, 1992, 1995, 1998)。他在《风险社会》一文中提出, 大众对风险越来越关心, 风险已经不再是“外部的”了, 它们源源不断地来自工业技术及其治理体系本身。于是更多的公众对“专家”体制及其生产出来的知识, 以及日益增长的信任危机采取了批判性反思的态度。贝克认为, 科学一方面制造了问题, 同时也产生了认识和解决问题所需的逻辑分析方法: 现代专家科学术语中包括“反思”一词。但是, 一些批评者指出, 这种观点使人们忽视公众领域中可能存在的其他知识体系、科学和社会秩序形式(Caplan, 2000; Lash *et al.*, 1996; Wynne, 1996)。

这些其他知识体系正是两种非常不同的研究传统所关注的焦点。一种研究传统关注“公民科学”(主要在欧洲和北美), 另一种传统则重视“种族科学”或本土知识(主要集中于低收入国家)。

现在公众或是自己出钱出力搞科研, 或是通过游说改变研究课题, 他们以这些方式获得了专家体制的科学视角, 却又对这一视角持批评的态度。人们将此称为“公民科学”(如Fischer, 2000; Irwin, 1995; Irwin and Wynne, 1996)。社会科学的这一支之所以生根发芽,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学的合法性在北方工业化国家的普通大众中发生了危机。1980年代初期, 许多人将此归因于大众对科学的一种错误理解: 科学是一种智力达不到的东西, 或知识的鸿沟, 需要通过大众科学教育来弥补。随后开展了大量的社会科学研究, 结果表明大众对科学的理解比想象的复杂得多, 微妙得多, 他们不仅关注科学的内容和方法, 还关注科学借以开展的制度、对科学的支持和资助, 以及对科学的控制(Wynne, 1992)。研究还分析了一些非专业人员通

过自己的研究和试验(如围绕有毒废弃物污染开展的“大众流行病学”调查), 直接参与、质疑科学和科学观点的个案。因此这些研究主要是将公民科学当作另类科学——仍在宽泛的科学范围之内——而不着重大众知识在当地社会成长、差别、概念和道德的嵌入关系中的发展方式。

关于本土知识的讨论正相反。这些讨论是围绕着亚、非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乡村问题展开的, 社会嵌入向来是问题的核心。这一传统的根基是20世纪初的社会人类学研究。这类研究在广泛的社会、文化人类学中细化了关于健康、农业、生态等问题的“知识体系”(如Evans Pritchard, 1937; Richards, 1939), 因此强调对“技术”的了解和信念一方面不能离开宇宙观和本地宗教, 另一方面不能离开社会秩序和流行的权力关系。于是研究的核心是探讨本地概念、隐喻、成语, 看这一切如何在其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产生意义。

1970年代初开始被称为“本土知识”的那部分知识, 与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科学”关系暧昧。有时它被看作宝贵的补充性资源, 只需用现代专家科学体制的术语重新包装一番(Brokensha *et al.*, 1980)。有时又说它来自另外一套概念、框架, 需要借助一种比较性的分析框架(Fairhead, 1992; Scoones and Thompson, 1994)。对本土知识的研究清楚地表明, 地方上对于技术性问题的争论和探讨与社会差异(如性别、年龄、种族的差异)、对资源控制权和社会政治权力的争夺纠缠在一起。但是这部分研究却不大提及本土知识与“专家”科学的对立, 与公民科学的传统形成鲜明对照。有关本土知识的研究常常指出乡下人的概念与现代科学中的概念根本不具有对应性。而这种强调比较的研究又常常从原住民群体的视角和观点得到动力, 这些人所



几内亚的一个村议会。M. Renaudear 摄影/Hoar Qui 供稿。

强调的多是本地知识传统的独立性，以及不同于国家现代化及发展道路的生活方式。许多研究记录了公众对发展知识的不信任，多数人认为这意味着远离科学、抵制科学，而不是积极地与科学相结合（如 Crush, 1995）。

因此，对公民科学的研究揭示了科学如何“走出实验室”，步入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中；而本土知识研究传统则指出，某些形式的科学从来就没进过实验室。这两种分析范式分别出自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可以说，它们各自与其特定环境相关联。然而，倘若因此就认为现代性转向了“晚近的”或“反思的”现代性，转向了公众对现代性的零散的批判和反思，那也过于突出以往对专业科学的接受（Lash *et al.*, 1996; Latour, 1993），从

而掩盖了某些社会、文化群体的经验。

关于本土知识的研究与关于公民科学的研究近年来开始出现理论上的融合。许多评论者认为，将本土知识与科学截然分开有很多问题。阿格拉瓦尔（Agrawal, 1995）说，如此区分容易引起误会，好像本土文化是静止的、封闭的，可作为全球化体系中的知识储备任人利用。从根本上说，本土知识与科学都应被看作是在历史实践中，尤其是在社会与制度环境中发生和发展，不应二者做任何根本的理论区分（Agrawal, 1995; Murdoch and Clark, 1994）。

对本土知识、公民科学和科学一视同仁，认为它们都是由社会决定并存在于社会之中，认为它们互不相同但都不完整，从理论上讲，这种视角能消除多个片面视角

所产生的根本分歧(参见 Haraway, 1988)。从这个角度讲,将产生于所谓“专家”体制的各种科学实践掰开来,看仔细,这非常重要,因为它们与政府的特定领域和体制,以及这些体制的社会要素捆绑在一起。政府部门与其他相关体制间的斗争可能影响科学发展的道路以及科学的应用。因此还必须研究处于社会中的知识、一系列中间行为人的实践,以及既有“市民”特征又有“专家”特征(从政策顾问、压力集团到教育家和大众传媒)的体制。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本土知识与科学知识之间的理论界线被打破而看不到科学的社会、政治关系,以及它们在不同环境下运作方式的重大差别。本土知识和公民科学研究文献所作的区分——不同知识之间的相对独立与它们在科学名下的相互参与,在真实性和经验性上也同样有效。下面的例子揭示了这方面的不同情况。然而,我们需要把注意力从知识的内容和认识论稍稍转移到知识发展、表达的历史和制度关系,才能将这些例子与其环境联系起来。

下面两个案例(详见 Fairhead and Leach, 待出版)讲的都是当地猎人与企图建立国家公园的政府、科学研究者和国际组织之间的交往互动,然而与知识的结合性质完全不一样,它们反映了更广泛的制度、社会关系及计划。这些案例还表明,“现代”、“传统”、“公民”和“土著”这类词汇在结合过程中频繁出现,但已是政治化的概念和表达,所涉及的更多是社会和制度关系,而不是知识的内容和认识论。

个案:猎人与国家公园

特立尼达

第一个案例发生在加勒比海地区特立

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一个公民组织自己展开调查,公开反对“专家”科学的方法和结论。该案例涉及西印度群岛大学特立尼达分院关于野生动物动态的科学研究,以及东南猎人协会对其研究成果的反对。

1990年代初,一位特立尼达生物学家在该国森林地带开展了野生动物数量变化的系列研究,作为西印度群岛大学生命科学硕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分(参见 Nelson, 1996)。对参与研究的机构的选择,有其独特的文化、历史背景。这项工作由来自威斯康星大学生物保护学系的一位高级访问教授负责监督,并共同发表研究论文。因此,这项研究诞生于生物保护学界两所知名科研机构的联系中。特立尼达林业部的野生动物处和世界银行资助的环境管理局也参与了这项研究。大学和环境管理局是特立尼达新近出现的保护机构,与林业部的野生动物处相辅相成,其高级雇员都接受过大学教育。这种构成及其成员体现现代保护观念,与国际科学和政策界接上了轨。而林业部的其他部门可不是这样,其雇员多半是从乡村生产活动中一步一步干上来的,那种分工等级所反映的是生产型林业。部里也有一部分工作人员接受过大学教育,所学大多是以造林为主的森林学。这方面的林业学家和林业学在特立尼达多年来倍受冷落。直到近些年环保主义在国际上兴起,森林问题才凸显出来,引起了另外一群城市知识分子的关注,他们发现生物保护以及自己的研究兴趣的前途在一些不同机构——野生动物处、环境管理局与西印度群岛大学的结合上。研究的另一个背景是一场激烈的争论:是否在特立尼达建立国家公园?由谁来管理国家公园,是由世界银行资助下新成立的国家公园管理局(其成员大多来自环境管理局—野生动物处—西印度群岛大学),还是由自称从

20 世纪初就管理着特立尼达的生物保护事宜的林业部？

获得狩猎许可证的猎人每年都必须填写《规定资料表》，交回野生动物处，野生动物数量研究项目利用表中所反馈的数据，估算猎获的哺乳动物数量。从数据中看，1990 年代初的 3 年中，该国主要森林地带的哺乳动物数量总体上在减少。狩猎被认为是野生动物减少的主要原因。

位于森林密布的东南地区的东南猎人协会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他们对将狩猎列为野生动物减少的主要原因的分析表示怀疑。他们提出了另外一些原因，说这些原因更重要，如占用土地导致野生动物失去栖息地，尤其是林业部搞的柚木和松木单一林¹。他们对西印度群岛大学和野生动物处的野生动物数量监控方法也有疑义。他们说，《规定资料表》不能作为分析的基础。猎人们不是在狩猎季节而是在狩猎季节结束后才填表，难免有记忆不准的地方^④。而且，他们填表的时候常常根据他们对国家野生动物管理科学和政策的理解搞一些“手段”。如果猎杀数字过高，他们就犯了过度猎杀的错误，如果数字过低，有关部门就认为野生动物数量在减少。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对狩猎的限制，于是他们在表里填上不多不少的数字，落个“皆大欢喜”^④。

协会的猎人有自己的方法，他们说，如果按照他们的方法计算，他们的活动并没有导致猎物种类整体数量的减少。他们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发明了一整套理论和方法，按这套理论和方法追踪野生动物的数量，就能得出他们的结论。他们的结论与生物保护学家的大不一样——或者说完全相反。协会主席说，猎物受到枪击或被猎犬追赶时逃跑范围的直径，可用来测量它的生活领地，于是能算出野生动物的数量。

逃跑范围较小，说明动物的领地小，数量多。逃跑范围大则正相反。逃跑范围和数量的关系不仅因物种不同而变化，而且受地域和其他因素影响。好几位猎人把多次观察的结果放在一起，以便建立可靠的方法。这种方法必须利用动物和动物栖息地才能使用，也就是说，只能在狩猎中发明，在狩猎中使用。在野生动物处认为动物数量减少的地方，猎人用这种方法估算，认为某些动物数量在增加。

这种对立不仅是科学的智力内涵和方法的对立。对哺乳动物数量以及狩猎对数量的影响的不同分析，关系到不同（相互竞争的）社会部门的生产，并由此关系到生物保护的社会和制度因素。

生物保护学的第一类看法是，哺乳动物数量减少与全体“猎人”有关，认为猎人对其资源不负责任。这一结论与野生动物管理者眼里猎人的漫画式形象不谋而合：猎人就是身材矮小但全副武装的偷猎者，他们违反国家法规，在狩猎季节以外或夜晚打猎。野生动物管理者支持特立尼达制订更为严格的狩猎规则（如 1998 年至 1999 年起草的“野生动物法草案”），扩大国家公园和保护区的范围，禁止猎人进入这些区域，以保持野生动物数量。

而东南猎人协会的科学则完全是另一套话语，猎人的形象是高贵、守法、有知识。协会领导人竭力把自己的成员与非法偷猎者、农民、大麻种植者区别开来。如果允许正经猎人进入野生动物保护区和国家公园，他们完全可以控制住这些人。他们说，不允许“真正的”猎人进入的地方——特立尼达现在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也正是偷猎者无法无天的地方，哺乳动物遭受的损失最大^{1/4}。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猎人们基于公民科学提出的论点为猎人与国家共同参与保护行动、控制不法分子提供了观念

的空间。

这种结合在什么样的历史和社会关系中才有可能并实际发生呢？我们应该注意到，协会主席本人就有自然科学学位，并担任公职。他与正规科学和政府机构的联系对他来说是一种教育，为他提供了一个基础，使他能够解构和直接批评西印度群岛大学/野生动物处研究中的体制取向和内容。此外，他在特立尼达的社会地位使他能够邀请大学教授参加协会的月会，并率直地向他们陈述协会的主张，还使他能够自信地与政府职员展开讨论。这样的讨论在包括新的野生动物法在内的各种政策发展委员会上发生过。由于特立尼达宣布要制定“参与式”政策，这些委员会就必须有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加。

东南猎人协会的成员五花八门。该协会的领导受过良好的教育，打猎的目的是为了休闲。但成员中包括小农，他们加入协会是为了取得合法携带火器的许可证，也觉得协会为他们表达自己的利益提供了一个平台。他们的乡村社会背景与众多以生产为主的林业职员相当接近，但是与那些在关于野生动物及其保护的观念上较为国际化的人士相去甚远。协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公民社会组织，成员们认为自己是特立尼达州的自由公民，而特立尼达也的确有一些渠道（比如报纸）可以经常、广泛地表达对政府政策的不同意见。1996年国家公园法案试图在保护区建立非常严格的排斥体系，规章中还允许随意进入猎人家中进行检查。东南猎人协会和它的兄弟组织，国家猎人协会，对此发出了大声的抗议，认为这是对人权的侵犯^{1/2}。这项法案最后被撤消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猎人协会通过媒体组织的公众抗议。这些经历使猎人在参与、批评政府政策及其科学时有了一种组织的意识。

然而，这种结合也反映出猎人们面对新出现的不确定性以及对自身地位的威胁而产生的忧虑。石油收入的减少以及由此导致的失业迫使许多人再次回到农村讨生活，也不管手段是否合法。于是这些“猎人”的社会身份就变得岌岌可危，尽管他们小心翼翼地躲开“偷猎者”、“大麻种植者”和其他“走邪门歪道”靠不法活动为生的人。同时，特立尼达的市民对日益高涨的国际环境运动和国际科学机构及组织通过影响和资助对该国科学研究、政策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也心知肚明。建立国家公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里面包括了各种支持、贷款条件以及出资人和外国学者的建议。在这种环境中，反对西印度群岛大学和野生动物处的科学，也就是反对国际影响和它所代表的对保护项目的模糊控制。

几内亚

第二个案例发生在西非的几内亚。猎人的知识深植于其文化和历史之中，较为独立于国家和国际资助的科学。尽管在国家公园的管理中，所谓“传统”猎人及其组织被拉来与政府和国外捐助组织搞了某种新式合作，情况却并没有多大变化。尽管投资者明确提出要“与本土知识合作”，但交流是有选择地进行，猎人们的知识和实践要符合国际上的保护论调才能选上，选上的还得重新包装。而猎人们也利用交流带来的机会，达到其他一些社会政治目的。像在特立尼达一样，要想理解这种结合（部分结合或不结合）的性质，还需从更广泛的制度关系和历史着眼。

几内亚历届政府一直非常关注国内森林和草原环境的恶化问题，最近一些国际机构也开始关注这个问题。由于轮耕、林火、狩猎以及当地人对资源的“无政府”利用，这一地区正在丧失其广袤的森林和丰

富的野生动物，一些科学考察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因此从 20 世纪初就有人提出要在这里建立并管理国家森林保护区和国家公园(Fairhead and leach, 1996)。1990 年代，环境和保护在几内亚重新受到重视，目前更是得力于国际上对物种多样化的关注。在这个低收入国家，政府部门(森林与野生动物理事会和国家环境理事会)十分倚重外国资助者的支持。欧洲通过发展援助的投资对加强政府的森林保护和建立国家公园作用尤其重大，例如在上几内亚就由欧盟投资新建了规模巨大的上尼日尔国家公园(Programme d'Aménagement des Hauts Bassins Versants du Niger, 1996)。

这一拨新公园和新保护区与猎人的关系似乎和从前的公园大不相同。欧洲资助者提出的新政策以及他们支持的林业代管人不设公园警卫，而是通过猎人组织工作。这些猎人“兄弟会”通过入会仪式、学徒网络和共同的仪式走到一起，他们常常被视为农村社会源远流长的特征，在上几内亚的曼德(Mande)地区尤其突出。资助者和政府的人说，之所以采取这种策略，是为了重视“传统猎人”关于动物种类和保护行为的“知识”。他们还说，猎人组织作为地方体制受到尊重，它有效地把环境信息传递给了其他村民，并规范了其他村民的行为。与“本土知识”和“传统组织”的合作还有利于资助者和政府组织树立新时代国际保护者的自我形象。对“当地文化”和“原住民”的尊重及其“参与”在新时代里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和财政上的重要性。

“环保通信与信息技术协助区域项目”(PACIPE)是欧盟资助的一个区域性信息与通信项目，旨在通过“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促进环保信息的传播。该项目与国家公园管理当局合作，改进猎人协会，或至少提高其某种形象。该项目指出：

狩猎是这样一种活动：狩猎者精于魔法、与超自然的存在关系密切、对动物和植物了如指掌。总而言之，它是具有超人力量的人的活动。回想一下猎人在传统社会中的关键作用，对我们很有裨益。猎人是(PACIPE n. d.)：

- ┌ 3/4 的村庄的创建者
- ┌ 良田的挑选者
- ┌ 水道和森林的勘探者
- ┌ 动物丰富的藏身之处和栖身之地的发现者。

其社会角色囊括了生存和生活的所有方面：

- ┌ 驱除邪恶势力的社区保护者
- ┌ 英勇的保卫者/战士
- ┌ 经验丰富的治疗者
- ┌ 鱼和动物蛋白的提供者
- ┌ 对社区有益的敏感任务的志愿者
- ┌ 葬礼等类宗教仪式的组织者。

PACIPE 根据自己对曼德帝国法律的理解，认为曼德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有一贯的规则，即 wa ton(“丛林法”)。这种法则自殖民渗透后就遭到破坏，而现在应该可以恢复。Wa ton 与神话和“禁忌”有关，这些神话将人与丛林(wa)连在一起，并警告人们违背这些法则所导致的危险。环境项目为了利用这些“传统法则”实行保护，一直在加强(或曰改变)猎人兄弟会。PACIPE 支持在区、专区、省和国家各级建立狩猎协会，仿照目前的国家行政等级，采取联邦结构。省一级新成立的猎人组织必须签署符合国家森林和环境法的“自然宪章”，使猎人兄弟会担负起遵守狩猎季节、保护濒危物种、扑灭森林火灾、强化自然资

源管理等职责。尽管 PACIPE 认为宪章应由相关的猎人分别起草,但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省级宪章都一模一样。上尼日尔国家公园四周各村的猎人首领被指定为村 wa ton 委员会的负责人,有权分配数量有限的渔猎许可证,并规定哪些人在何时何地猎取何种动物、哪些人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生火。

但在与曼德猎人的直接交谈(如 Fairhead and Leach, 1996; Leach, 1994)中,我们却发现这样的“伙伴关系”只涵盖了猎人的知识、实践和社会定位的一小部分,而且这一小部分也经过了重新包装,以适应当代生物保护的需要。其他社会人类学家的研究显示了同样的结果。

首先,猎人知识在现代环境主义中的表达大多忽视了包含这种知识——以及 wa ton 法则——的更广泛的观念框架。在保护项目中,wa ton 被表现为纯粹的生态管理,间或有几个“传统禁忌”围绕四周,这完全是西方现代生态观,根本没有考虑曼德世界结构中生态事物与社会事物的同质性(参见 Croll and Parkin, 1992)。在这种环境下,动物的行为、运动、繁殖以及狩猎的成功都受社会行为和事件的影响,包括村民的家庭是否和睦,人际关系是好是坏。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破坏了这些和睦规则,都会“困住”森林。要重建正确的社会/生态关系,必须请精通当地土地神法则的专家“清洁”土地。专家——猎人通常还有药,他们不仅能够清洁土地,能使土地不利于某些人住——并在这个过程中干预当地的社会政治和性别关系。土地神和森林神的复杂世界,以及对强大魔药的信念,构成了影响猎人知识和实践的社会文化的另一些方面。

其次,当代资助者都把猎人说成乡村社会生活的核心权威人物。对猎人社会地

位的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一些民族志研究(如 Jackson, 1988; McNaughton, 1988)表明,在村民眼里,猎人的社会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说介于“正常”和“不正常”之间,因为他们与森林神过往甚密,他们常常独自在森林里度过很多时间,还因为他们据说拥有很厉害的、神秘的“魔”药,这些药能破坏和打乱社会结构。猎人只是当地社会政治生活外围掌握不可预测的危险媒介的主体,而不是其支柱。

再次,资助者在与猎人知识结合的过程中,绕过了“真正的”猎人(那些对森林的社会/生态意义的方方面面都了如指掌的人)和其他猎人(有些人被称为“扛着枪到外面放的小男孩”)的区别,而猎人自己对此是分得非常清楚的。“小男孩”在这里是个蔑称,指的不完全是年龄,更是没有经验、知识、药品,在有入会仪式的地方,还指那些没有参加过正式仪式的人。但在很多地方,的确有人,尤其是少年,设陷阱、用烟火和猎犬捕捉蔗鼠、用枪打猴子卖钱。

猎人知识中有很多方面在他们参与国家公园管理时不曾涉及。这些知识有鲜明的“形式”,但大多无法在项目的范畴和表述中出现,或为后者所排斥。同时,猎人及其组织也利用参与国家公园管理的机会,达到另外一些社会政治目的。

例如,成年猎人与乡村青年关系紧张,猎人兄弟会非常希望加强对所有持枪猎人的控制。他们能借助生物保护组织达到这一目的,因为保护组织认为“自由”猎人行行为无法无天,认为他们用烟火或其他方式过度捕猎是导致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国家公园管理处是规定,只有猎人兄弟会的持卡会员可以携带武器,责令兄弟会监督此事,并将违反者报告政府官员。然而,项目人员在这个过程中并不遵守猎人自己划分的界限,而是围绕本土观念与全球生

态格局划分界限。一位欧盟项目主任提出把公园区“本地”符合项目目标的猎人和为了商业目的的“外来”猎人区别开来,让“猎人制约猎人”。

让更多持枪的人加入猎人兄弟会是几内亚政府的另一项政策,旨在控制乡间的武器,这是目前关系到地区稳定的真正的国家安全问题。国家猎人协会头头在接受乡间电台的采访时说,“我们的政府有两支军队,我们就是第二支军队。”总统也不断把曼德的猎人向国家军事方面拉拢,让他们在抵抗塞拉利昂叛乱、保卫边界的战争中与几内亚军队并肩作战。猎人和国家都把环境问题与安全问题联系在一起,用环境保护和本土性来保护“他们的土地和他们自身”,抵抗“外国渗透者”,而侦察的任务就落到了猎人身上。领头的猎人积极利用与国家合作的新机会,加强自己在乡村社会和政治关系中的力量^{3/4}。

由于这些联系,一些发言人认为猎人兄弟会与政府的关系非常密切,而猎人们却在使用历史悠久的策略,避免距离过近,保持自己的社会、政治以及知识的独立性。例如,猎人们常常把稚嫩的年轻学徒安排在村、县和省办公室的领导位置,觉得他们会听话地执行成年人普遍接受的政策,也会听话地不执行不受欢迎的措施。

猎人与资助者之间的若即若离,也反映在猎人组织与政府及欧洲国家暧昧的历史关系上。早先殖民时期的生物保护行动开始之时,正值法国殖民者与曼德军队和率领军队的猎人战士之间的战争刚刚结束。在殖民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猎人兄弟会充当着反法论坛的角色。执政者认为他们对本来就不稳定的政权是一种巨大的威胁,因而一直竭力压制他们的活动。猎人们也因此独立后伺机重新组织起来,形成行政管理的力量。第一批省级猎人协

会在1960年代初的新气象中成立,而且得到了新共和国政权的承认,但表面上必须采取“去神秘化”的形式,以符合塞古·杜尔(Sekou Tour)独创的技术中心论色彩颇浓的非洲社会主义文化政策(Riviere, 1971)。地方组织向来就不是中立的,而是浸淫在本土文化传统之中,因此猎人组织长期以来一直作为国家和地方政治中有组织的力量而得到建设。今天,猎人组织与国家若即若离的关系,又加上当代政党政治的因素:兰萨纳·孔戴(Lansana Conté)领导的执政党,几内亚统一进步党(PUP)在曼德地区极不受欢迎,可想而知,猎人与国家机构、国家支持的项目以及国家出钱建立的全国猎人协会之间的整合极为脆弱,激烈的政治对立一触即发。

结 语

这两例个案突出显示了所谓业余知识与专家体制产生的科学视角的不同关系。特立尼达的猎人协会与西印度群岛大学由于实践的不同而各自采取不同的方法,具有不同的社会意义(如地方和国家对资源利用的监督)。但他们在同一个政策范畴(如何行动)与各自标榜为科学(尽管双方都批评对方“不科学”)的实践框架内,解决同一个问题(野生动物数量)。这种合作框架主要产生于西印度群岛大学/政府方,因此在这个案例中,公民批判地加入到专家体制内的科学/政策争论中。然而双方都有基于对森林和动物不同的经验和制度认识的实践,其目的在于利用而不是神化,其要求是在场(监控非法利用)而不是缺席(关闭保护区)。而且他们也同时考虑猎人的社会目的——在特立尼达的现代化过程中将自己与“偷猎者”撇清干系。

几内亚的情况正相反,猎人组织与国

家/资助者组织虽然因为国家公园而“结合”到了一起,为的却是根本不同的目标:后者企图制止野生动物数量减少和环境恶化,而前者是想巩固自己在地方、国家甚至区域政治中的权力。保护项目中对猎人兄弟会及其“本土知识”的促进倒是提供了一些实践,能够兼顾双方,但既没有共同的框架,当然也就没有直接的批评。同时,猎人知识及其社会性的其他方面被甩在外面,没有被这些碰撞“捕捉住”,而是相对独立于这些交锋之外。尽管知识的这些方面也为反对政府和资助者关于环境恶化和社区组织的视角提供了基础,但这种对立来得更微妙,更无声,并且发生在其他领域中。

这些相反的案例说明,公民科学隐含着对专家体制生产的科学的某种参与,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分析推理的专家体制科学。也说明有些人(如几内亚人)的立场完全不同——为那些“分析推理”的结构所“捕捉不到”,却不得不面对那些结构的实际效果,有时甚至能操控它们,为自己牟利。

这些差别无法轻易地以欧洲和亚非拉及加勒比海地区的地理位置加以区分,但这两边分别产生了“公民科学”和“本土知识”。它们也无法推翻任何环境中都存在多种片面视角的现实。但是,这种多样性中的哪些因素在何时何地以什么方式结合在一起,却取决于特定的历史及社会、制度关系。它们影响着不同的科学家和业余人士生产知识的实践、他们的表达方式,以及他们面对的更广泛的问题。

知识的政治形式在几内亚和特立尼达表现得截然不同,这说明两地的殖民历史和独立后历史对当代科学的社会关系产生了不同影响。几内亚在1958年独立以前,除白人统治的殖民机构之外,就很少有体制内的科学研究,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领域都是这样。独立的社会主义政权以“非洲化”和“科学”为起点,开始了现代化进程,建立了3个第三教育(tertiary education)中心,并且格外注重农业和环境,在每个省建立了一个农业培训中心(Riviere, 1971)。接受教育、接近科学,意味着接受与乡村原有的(“本土的”)知识形式和制度有天壤之别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治认同。本地视角和需求在制定科学发展目标时几乎没有考虑。但这并不是说本土的实践被削弱了,它们只是继续在更独立的领域内运作(这些领域偶然被新的政治和科学精英用来当作强化自己力量的“传统手段”,但绝对与他们的科学活动毫无关系)。本土知识和实践就这样日渐强大和独立,成为国家资助的科学的对立面。1984年东欧模式的社会主义在西方影响下崩溃,几内亚开始了自由化时代,但这种局面基本没有什么改变。总之,这些历史久远的关系在专家体制与许多村民的视角之间,制造了巨大的隔阂。

特立尼达的大众教育可追溯至1830年代,教育创造的机会影响了贫困移民社区的新宗教和教育伦理,并为新兴的中产阶级奠定了基础。石油开采浪潮(oil boom)前后急剧扩大的都市地区,情况尤其突出。这使得更多的民众能够通过媒体、地方和国家政治,现在还有大学,在这些体制的规则下和框架中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和科学讨论。

具有比较意义的是,特立尼达人口文化水平颇高,地方和国家的非政府组织非常活跃,他们以市民组织和媒体为论坛,进行社会动员和讨论,结合强大的国家科学体制开展公民科学。与此相对照,几内亚由于教育、文化和政治历史的差异,没有形成如此公开的公众参与形式,不同知识体系之间的隔阂较顽固。但是国家之间的差

别不能掩盖各国一部分人的相似经历。这些人的经历由他们在科学产生的社会关系中的位置所决定。本文列举的猎人参与国家公园管理的案例,突出显示了特立尼达和几内亚的差别,但特立尼达的其他人——如一些边缘化的“占地”农民——也同样无法在科学和政策体制内表达他们的知识和视角,他们的经历与几内亚人没有这么大的差异。从猎人案例中可以看出,那些参与公民科学、与国家政策形成对峙的,仍以受教育较多的精英为主。反之,几内亚城市居民中也有较统一的“公民科学”活动,如围绕废弃物和环境卫生的学生运动。

有人说所有知识都是社会的产物,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抹平了本土知识与科学知识,业余知识与专家知识的差别,把这些差别都归入各种不同的视角。但是我们的案例显示,知识体系之间的对立,其方式有重大差异,反映了特定的社会、历史关系和实践。“市民”、“本土”这些分类,本身就是在

这些社会历史关系中产生的,需要在发展着的社会和制度历史,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表达的政治中进行观察。社会人类学家对本地知识的研究,局限于其理论兴趣和殖民统治者表现和记录封闭文化的需要。最近发展话语中有关本土知识的表述,与此不无相似之处,是由当代制度背景以及保护和发展战略所决定的。但也有些人以“本土”或“传统”等字样描述自己的知识,构成并强化了与现代科学及其体制的分裂,成为争取独立、自主或当地社会生活中的权力——如我们讲述的几内亚个案——的政治斗争手段。由于“原住民”在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Kingsbury, 1998),给某类知识贴上本地、纯正的标签,以区别于现代科学,这种表述在全球以及国家舞台上越来越突出了。

〔黄 觉译〕

Notes (注 释)

1. Interview, President of the South East Hunters' Association, Rio Claro, 6 July 1999.

2. Winsie M. of Mayaro, "Letter to the Editor", 24/8/96, *Trinidad Guardian*.

3. Interview, MPhil student working with north-eastern hunters, St. Augustine, 15 May 1999.

4. Interview, President of the South East Hunters' Association, Rio Claro, 6 July 1999; "South hunters: Ganja crops destroying wildlife" by Richard Charan, *Newsday*, 8 May 1999.

5. "Wildlife Bill a Threat to Democracy", *Trinidad Guardian*, 22 May 1997.

6. Interview, Mamadou Bereté, Kankan, February 1999.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 AGRAWAL, A. 1995. "Dismantling the divide between indigenous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26: 413-439.
- BECK, U.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 BECK, U. 1995. *Ecological Politics in an Age of Risk*. Cambridge: Polity.
- BECK, U. 1998. *World Risk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 BROKENSHA, D., WARREN, D. & WERNER, O. (eds) 1980.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s and Development*. Lanham, 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CAPLAN, P. (ed.) 2000. *Risk Revisited*. London and Sterling, Virginia: Pluto Press.
- CROLL, E. & PARKIN, D. (eds) 1992. *Bush Base: Forest Farm: Cultur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 CRUSH, J. (ed.) 1995. *Power of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 EVANS-PRITCHARD, E. E. 1937. *Witchcraft, Oracles and Magic among the Azand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AIRHEAD, J. 1992. "Indigenous technical knowledge and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Sub-Saharan Africa: a critical review", Paper prepared for SSRC project on African Agriculture, USA.
- FAIRHEAD, J. & LEACH, M. 1996. *Misreading the African Landscape: Society and Ecology in a Forest-Savanna Mosai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AIRHEAD, J. & LEACH, M. forthcoming - *Science, Policy and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ISCHER, F. 2000. *Citizens, Experts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Politics of Local Knowledge*.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 HARAWAY, D. 1988.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Feminist Studies* 14: 575-609.
- IRWIN, A. 1995. *Citizen Science: A Study of People, Expertis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 IRWIN, A. & WYNNE, B. 1996. *Misunderstanding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ACKSON, M. 1988. *Paths toward a Clearing: Radical Empiricism and Ethnographic Inquiry*.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KINGSURY, B. 1998. "'Indigenous peoples' in international law: a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to the Asian controversy".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92(3): 414-457.
- LASH, S., SZERSZYNSKI, B. & WYNNE, B. (eds) 1996. *Risk, Environment and Modernity*. London: Sage.
- LATOUR, B. 1993.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 Wheatsheaf.
- LEACH, M. 1994. *Rainforest Relations: Gender and Resource Use among the Mende of Gola, Sierra Leon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MCAUGHTON, P. R. 1988. *The Mande Blacksmiths: Knowledge, Power and Art in West Af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MURDOCH, J. & CLARK, J. 1994. "Sustainable knowledge". *Geoforum* 25: 115-321.
- NESLON, H. 1996. Ecological studies of forest mammals in the West Indies, with a focus on Trinidad. M.Phil. UWI 1996.
- PACIPE, N. D., "Environnement, savoir traditionnel et communautés locales: le PACIPE pour le retour à l'ordre naturel des choses", Conakry: Programme Régional d'Assistance Technique à la Communication et à l'Information sur la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PACIPE).
- PROGRAMME D'AMENAGEMENT DES HAUTS BASSINS VERSANTS DU NIGER 1996. *Projet Parc National du Haut Niger: Proposition pour le Plan d'Aménagement 1997-2001*. Conakry: Direction Nationale des Forêts et Faune and European Community.
- RICHARDS, A. I. 1939. *Land, Labour and Diet: an Economic Study of the Bemba Trib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IVIÈRE, C. 1971. *Mutations sociales en Guinée*. Paris: Editions Marcel Rivière et Cie.
- SCOONES, I. & THOMPSON, J. 1994. "Knowledge, power and agriculture: towards a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in I. Scoones and J. Thompson (eds). *Beyond Farmer First*. 16-31. London: IT Publications.
- WYNNE, B. 1992. "Misunderstood misunderstanding: social identities and public uptake of scienc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1: 281-304.
- WYNNE, B. 1996. "May the sheep safely graze? A reflexive view of the expert-lay knowledge divide", in S. Lash, B. Szerszynski and B. Wynne (eds). *Risk, Environment and Modernity*. London: Sage.

内容提要

本土知识与分类战略

阿伦·阿格拉瓦尔

随着人们对本土知识的兴趣的增强,近年来出现了保护本土知识并使之通俗化的战略。本文探究了这些战略中较具共同性的一个:在可以公开使用的数据库中对本土知识进行收集、分析和分类。本文考察了构建数据库战略的可行性以及本土知识科学化过程所包含的矛盾。同时分析了知识的科学化所产生的实践的、认识论的和政治的后果,认为在数据库创建中包含的许多弱点源于对原住民存在于其中的权力关系的注意不足。

〔郭建业译〕

对垒的知识体系:西非和加勒比海地区的

“公民科学”与“本土知识”

梅丽莎·李奇 詹姆斯·费厄海德

“本土知识”和“公民科学”分别代表出现在南半球和北半球的两套话语。本文比较这两种传统的异同,探讨它们如何代表不同的知识体系以及“他者”视角与现代科学的联系。说到底,“本土知识”论强调不同知识体系之间的概念、道德差异,而公民科学说则强调它源自与“专家”体制生产的科学的直接联系和对立。可是还有一种说

法:一切知识都是社会的产物。这种说法抹平了本土/科学、外行/专家之间的差别,将其归入各种不同的视角,以及不同社会主体因地制宜的实践。按这种说法,以上两种观点就都不大站得住了。然而不能因此掩盖知识体系间对立方式的真正差异,也就是那些反映着社会关系、科学实践以及它们生长于其中的制度史的差异。本文通过加勒比海地区(特立尼达)和西非(几内亚)猎人与国家公园的两例个案探讨这些差异,说明从一样的社会、历史关系中如何产生了“本土”、“市民”这样的分类。

〔黄觉译〕

发展话语中第三世界妇女知识的构建

舒布赫拉·古鲁拉尼

虽然有大量的文献对区分土著知识和科学知识提出了质疑,但是第三世界的农村妇女仍不断被土著化,她们的知识被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的新途径。本文引用印度库马翁-喜马拉雅山区(Kumaon Himalayas)的民族志实例,考察了妇女知识的构建,并提出了妇女知识在实践中是如何产生、传播和共享的问题。本文提请人们注意知识政治学,认为妇女知识是日常劳动和生活实践的产物,而日常劳动和生活实践又受着具有文化偶然性